

百年南开暨南开大学建校八十五周年纪念丛书

南开学人 自述

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 编
《南开学人自述》编辑组

NANKAIXUERENZISHU

南开大学出版社

第二卷

百年南开暨南开大学建校八十五周年纪念丛书

南开学人自述

(第二卷)

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南开学人自述》编辑组 编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津

谨以此书献给百年南开
暨南开大学建校八十五周年

百年南开暨南开大学建校八十五周年
纪念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任：陈 洪

副主任：霍耀秀 梁吉生

委员：高怀英 李广凤 佟家栋 王之江

王处辉 肖占鹏 阎世平 张东升

张亚辉

主编：陈 洪

序

陈 洪

传承着历史的辉煌，沐浴着新世纪的阳光，我们迎来了南开学校创办百岁华诞和南开大学建校八十五周年庆典。作为校庆活动的一部分，我们编辑了《百年南开暨南开大学建校八十五周年纪念丛书》。

南开是个有特色的学校。从历史上讲，在百年前的风雨飘摇之秋，私人创办这样一所有现代意义的学校，筚路蓝缕，开拓前行，由中学，而大学，而女中，而小学，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树立起良好的社会声誉。在抗战的烽火连天中，薪火相继，弦歌不辍，在昆明，在重庆，在自贡，都展现着南开旺盛的生命活力，成为中外教育史上的奇观。从现状看，独立办学的南开各校，也都自有鲜明的个性特色，事业更加兴旺发达。

南开大学的特色表现在各个方面，但就其根本而言，恐怕更多地表现、保持在教授们中间，在他们的学术追求中，在他们的育人风范中。孟子曾讲：“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

在八十五年的办学过程中，曾经并正在活跃着一大批无私奉献、忠诚教育的专家学者，涌现出为数不少的学术大师，他们有个性的学术精神及其在各自学科领域表现的治学成熟，为学校在海内外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已经成为学校的宝贵财富。为此，我们编辑了《南开学人自述》，分卷出版，其目的在于展现南开学者的学术风范，总结可贵的学术经验，传承赓续，继往开来。

于此同时，我们还编辑了《最忆是南开》，是想追寻南开的历史脚

步，记录一些旧闻逸事，它不是全面展现南开一个世纪风风雨雨的沧桑变化和曲折而又辉煌的发展历程，只是对南开故人、故事的叩问，对南开吉光片羽的回眸，是对南开贤者的颦笑写真。“石蕴玉而山晖，水含珠而川媚”。南开之所以为南开，从中当能察知一二。

南开与北大、清华共建西南联大的历史，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当年南开在联大生活的师生大多谢世而去，健在者已是“鲁殿灵光”。这次许多先辈及其后人，献出珍贵历史资料，一些研究校史的学者，也慨捐所藏，编成了《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为我校的联大历史研究，保存信史，至为可贵。

收录“丛书”的还有《东方振兴与西化之路——纪念陈序经诞辰一百周年论集》等。

这里我要特别感谢范曾先生，他以其近作，贡献于“丛书”，这些艺术佳作，为“丛书”增色添辉。

序者“叙”也。为《南开学人自述》作序，为校庆纪念“丛书”作序，不能不有诚惶诚恐之感，但因分管了这项工作，主持了“丛书”的策划与组织，又蒙编辑同人的支持，只得勉力写下这些文字。乌菟之见，尚祈师友指正。

感谢为“丛书”的编辑出版作出贡献的有关单位，感谢参与编辑工作的同志。

谨以此书献给百年南开暨南开大学建校八十五周年！

目 录

序 陈 洪

- 宁宗一 教书人手记 / 1
- 孙昌武 南开和我的佛教文学研究 / 18
- 曾晓渝 感受南开 / 27
- 张 毅 天道酬勤 / 34
- 张友伦 可以做得更好一点 / 41
- 王敦书 我的人生轨迹和学术道路 / 47
- 郑克晟 治史五十年，弹指一挥间 / 59
- 陈生玺 泛舟学海试航录 / 74
- 张 象 我在南开校园的 50 年——历史、非洲、音乐 / 88
- 俞辛焯 躬耕南开园 甘苦五十秋 / 103
- 冯尔康 史学论著需要时间的检验 / 123
- 陈振江 学术人生路漫漫 / 133
- 于 可 于可自述 / 149
- 刘泽华 答客问——漫说我的学术经历和学术理念 / 161
- 洪国起 南开哺育了我的学术生命 / 173
- 米庆余 史学研究是对世界观的检验 / 191
- 南炳文 我的治学经历 / 203
- 白新良 六十自述 / 218
- 李喜所 我的三个“十年” / 225

- 李治安 我如何研习中国古代史 / 236
- 陈志强 我学拜占廷史 / 250
- 李剑鸣 无涯学海初扬帆 / 259
- 陈晏清 “返本开新”——我的学术活动历程 / 274
- 车铭洲 凡学之道 严师为难 / 288
- 崔清田 我的教学与科学研究经历 / 300
- 王南湜 探寻我们的精神家园 / 314
- 杨心恒 攻书不怕难——我的两次学术攻坚 / 324
- 刘珺珺 探索在学科之际——从自然辩证法到科学技术人类学 / 333
- 叶梧西 南开岁月追忆 / 342

后记

宁宗一

教书人手记



1950年我从北京来天津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学习。当时的系主任是由西南联大转来的并以研究《洛阳伽蓝记》闻名的彭仲铎先生。担任古典文学讲授的还有华粹深、孟志荪和朱一玄三位先生，语言学和文字学的老师是邢公畹、张清常和杨佩铭三位先生，助教只有张怀瑾先生一人。由于当时课程较多，几位老师负担极重，所以采用了“就地取材”的办法，聘请了阿英、芦甸二位先生讲授文艺学。方纪虽然担任政府部门工作又从事文学创作，但还是长年给我们讲俄罗斯苏维埃文学。阿垅先生则开了诗歌讲座课。何迟先生在创作相声、改编戏曲之余，应华先

生之约给我们讲“人民口头创作”一课。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则是请了北师大的李何林先生和北大的王瑶先生分别讲授前后两段。诸多名师的传道、授业、解惑，使我们入学两年即学到了很多基础理论知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52年院系调整对南开大学来说不啻为一次“盛大节日”。在我看来，具体到南开中文系，它后来能跻身于全国高等院校中的中文系的前列，是和开国后的这第一次教育改革分不开的。当时我们迎来了希伯来文学研究专家朱维之先生，吴梅的大弟子、曲学专家王玉章先生，原中山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李笠先生，中国文学史和修辞学专家王达津和陈介白先生，还有文艺理论家顾牧丁先生。教育部为了加强南开中文系的领导力量，特别派了李何林先生担任系主任。与众多著名专家、教授一道来的是刚刚从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院毕业的许政扬先生和清华大学毕业的陈安湖先生。不久以后，又从北京马列学院调来了古汉语专家马汉麟先生。现代汉语专家宋玉珂先生在稍后时候也来南开任教。这是一个相当强大的师资阵容，各个学科也为之完善，中文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和朝气。这些良师都曾从各个方面给予我日后的学术道路以重要的影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院系调整后新学期开学第一天师生大会上，李何林先生自我介绍后，又一一介绍了各位新旧中文系教师。而在介绍许政扬和陈安湖二位先生时，李师特意点明许、陈两位是燕大和清华的高材生，是作为何林师调入南开的一个条件，特请部里分配给我们的。这颇有文字下加着重点的意味，所以同学都有很深的印象。如果说到印象，对我个人来说，可能还和二位青年教师的风度有关。他们不仅来自名牌大学，而且都具有典型的南方学子的文秀儒雅的风采，所谓文质彬彬也。特别是许师的中式对襟蓝布外罩和中分式背头，瘦弱的外形却蕴含着有一股灵秀之气，都令我在直觉上感到，这位孙楷第先生的亲传弟子必定是个俊杰之士。实至名归，许师后来逐步显示的学术研究实绩，完全证实了我的第一次直觉的正确。如果说有什么感应

的话，这“第一次印象”，就真的奠定了后来许师作为我的导师的那一段极不寻常的缘分。

许政扬先生在历史系为二年级同学讲一个学年的中国文学通史，要从先秦讲到“五四”前，共一百零八节课。直到1953年第一学期，他才给我们本科生讲文学史中的元曲部分。他总共讲了二十四节课，四周的课让我们三、四两个年级的同学充分领略了许师的博学多才和个性魅力。这是一种崭新的感觉：用练习本写就的密密匝匝的讲稿；讲课时舒缓的语气中具有颇强的节奏感；用词、用字和论析充满了书卷气；逻辑性极强，没有任何拖泥带水的枝蔓和影响主要论点的话；板书更极有特色，一色的瘦金体，结体修长，笔姿瘦硬挺拔，竖着写，从右到左，近看远看都是一黑板的漂亮的书法。如果说这是“形式”的话，那么他的讲授内容更令我们感到深刻和精辟。比如在讲《西厢记》时，首先是顺向考察，这样我们就把握了王剧创造性改编的关键。而在横向比较中，许师从俄译本直接引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话：“结婚是一种政治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的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这真是画龙点睛的一笔，使我对《西厢记》爱情和婚姻的意义，有了一种豁然开朗、茅塞顿开的感觉。今天回忆起这一点，我深切地感到许师对理论修养的重视，这对我半个世纪从事学术活动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上大学期间，我对自己所崇拜的老师的讲课，一律采取“有闻必录”的方式。缺点是不能及时领会、消化课程内容，并在追踪其观点时展开独立思考；但好处是，有了完整的记录可以慢慢消化老师的授课内容。许师的课，最大特色是，只要你能“跟得上”，记录下来一看，就是一篇完整的绝妙的论文。我的办法虽属笨法之一种，但我觉得获益匪浅。五十个春秋，经过了风风雨雨，许师讲的宋元文学史元曲部分和选修课“元曲”的笔记，我至今保存完好。为了备课和写作，不时展读，仍然给我很多启发。

一晃到了1954年7月，我毕业了。从性格上考虑，我渴望当个记者，但分配名单下来时，却让我留系任教，而且分到了古典文学教研室，这完全是我始料不及的。我虽无法拒绝当教师，但我怕自己教不了深奥的中国古典文学。我提出的唯一理由是，我的毕业论文是李何林先生指导的《论解放四年来的长篇小说》，所以请求从事现当代文学教学工作。当时担任系助理的朱一玄先生找我谈话，第一条当然是要服从组织的安排；第二条是跟许先生学，并担起历史系的文学史教课任务，以便尽快请许师回本系任教。“跟着许先生学”，一锤定音。许先生是我的导师，使我安下了心，并于当天下午拜见许师。

许师仔细听了我的自我介绍，沉吟片刻后说：“我先给你开个书单，你从现在起就边讲课边读这些书。”两三天后我就收到了许师给我的一篇三十本书目单。这是一个既简明而又沉重的书目，从朱熹的《诗集传》，王逸章句、洪兴祖补注的《楚辞》，一直到龚自珍的诗。三十部书中除我读过的几部章回小说外，竟还包括我望而生畏的《昭明文选》、郭茂倩编的《乐府诗集》以及仇注杜诗、王注李诗。许师看我面有难色，于是作了如下说明：一、这些书要一页一页地翻，一篇一篇地读，但可以“不求甚解”；二、这些注本都是最基本的也是最具“权威性”的，注文要读，目的是“滚雪球”，你可以了解更多的书，包括已散佚的文献；三、把有心得的意见不妨扼要记下几条，备用备查。一纸书目，三点意见，对我一生教学治学真是受用无穷。说实话，我就凭着这三十本书的基础，逐步拓宽阅读范围，教了三年历史系的文学通史和三年外文系的古典文学名著选讲，应当说基本上没有出现大的纰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一步步明辨出许师的一片苦心：第一，我的国学底太薄，必须先打基础；第二，让我硬着头皮苦读几部较大部头的原著，而不让我先看各种流行的选本，目的就是为了让避免某名牌大学出来的毕业生竟不知“古诗十九首”出于何书、乐府诗又是怎样分类的尴尬！

在这里我还要重重地提一笔，50年代的南开中文系由李何林先生

定了一个规矩，青年助教上课前必先在教研室试讲，正式上课时，导师要进行抽查。我在给历史系讲文学史课时，李师共听了三次课，而许师竟随堂听了六周课。李师对我授课多从技术上和仪表上提出意见，比如指出我的板书写得太草，写完挡住了学生视线以及说话尾音太轻，后面学生听不清楚，以及中山服要系好风纪扣和皮鞋要擦干净等等。许师对我的讲课的意见则多着眼于疏解的准确性、分析阐释的科学性等等。当然，对我读错的字，也一一指出，这些就是所谓匡正悖谬、补苴罅漏。而我也要在下一次上课开始时，就向同学正式纠正自己讲错了的地方。这种从对青年教师的严格要求开始，不仅奠定了南开中文系严谨的学风和科学的教学规范，而且对我大半辈子从事教学工作以及认真负责的课徒态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一边在给同学上课，一边听许师为五四级同学讲专题课“元曲”。应该说，我是一个好学生，不缺一节课，同样像学生时代一样做了完整的听课笔记。二十几年后我成了硕士生导师，在讲元曲诸课时能得到些许好评，其实都是许师原先给我打下的坚实基础。但是，如从讲学艺术来说，我太缺乏的是许师的那种娓娓道来的风度和使聆听者强烈感受到的一丝丝飘逸的气息。我虽时时刻刻也想克服我讲学时的那种匠气、呆板和矫情，但却难以做到像许师那样对博大的艺术世界的向往和追求。我想，这可能就是素质、学养和文化底蕴的差异所造成的距离吧！

如果说，此前我还是跟着许师学习如何从事教学工作的话，那么从1956年，也就是许师校注《古今小说》开始，我就正式进入了向许师学习如何进行科学研究的新历程了。

约在1955年底，人民文学出版社为系统整理中国优秀的古典小说，在“四大小说经典”出版的同时，重点抓了“三言”的整理工作。

结果是冯梦龙选编的第一部也是最精彩的一部“古今小说一刻”（即《喻世明言》）就委托给了许政扬先生。那时许师整三十岁。

小说研究行家多清楚，“三言”如中国众多小说名著一样，由于版

本不同，刊刻不精，文字上多有歧异和讹误。许师在考订版本源流的基础上，选择善本、足本为底本，以有价值的参校本比勘对校。他倾其心血，发挥其学识之优长，在训诂、校勘中，真正做到了精勤与博洽的统一，且细密与敏锐相得益彰。而琐屑与难考之事，亦以求实之精神，不妄下一语。另外，细心的读者会发现，许师常于校注中开掘前人未发之意，修正前人的某些谬误，此锲而不舍的探寻文本真诠之精神，对我大半生的治学态度有着深刻的影响。他经常结合《古今小说》的校注工作给我讲解长期被误解的语词。比如，把“行院”解作妓院，就是历来注家的误解。许师征引大量资料，说明“行院”乃是同业的一种组织，各行皆有，艺人中自然也有走江湖的艺人，到一个地方演出，就有当地的“行院”，帮助他们安排演出或居住的地方和用具。于是许师引用车若水的《脚气集》的记载推而论之，凡伎艺人等所谓的“行院”，主要就是这个意思。许师进而论证，用“团体会社”的名称来称团体会社中的人，乃是元明之间常见的一种语言习惯。在这个意义上，把“行院”中人即妓女也称之为“行院”，这才成了最有说服力的、最完善的、最正确的解释。再比如，通常在古典小说、戏曲中，往往把“一彪人马”误印为“一彪人马”。从此以后，就以讹传讹。许师对我讲，宋元时代仅有“一彪人马”而无“一彪人马”，他说，“彪”字字书不载，或以为是“彪”的形误，其实并非。他征引《谢金吾诗酒红梨花》第四折音释“彪”音“磋”。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下“一彪”条：“虏中谓一聚马为彪，或三百匹，或五百匹。”可见，“一彪”就是一大队的意思，原系北方方言。许师这种如谈家常、平等对话的态度，不仅体现了学者的风度，对我更为重要的是他用循循善诱的方式，把一个治学粗疏的我逐步引导到追求严谨的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所谓“得窥其门径”应当说是从此时开始的。

值得一提而且至今仍令我感到温馨的是，许师总是在两个星期中挑一个闲暇的日子带我到天祥市场去淘书。

1955年左右，那儿是一个极大的图书市场，以旧书为主，而《万

有文库》和《丛书集成》的各类小册子，堆成了山，三五分钱可以买到一本很有用的书，花上四五毛钱就可买到《李太白集》。这时，许师总要提醒我买些什么书，比如《事物纪原》、《古今事物考》、《释常谈》、《续释常谈》、《通俗编》、《挥麈录》、《梦溪笔谈》、《鹤林玉露》、《邵氏闻见录》（前后）、《侯鯖录》、《齐东野语》、《云麓漫钞》、《独醒杂志》、《能改斋漫录》、《夷坚志》、《辍耕录》、《老学庵笔记》等等。另外，他还指点我买一些现当代著名学者的书，比如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就是当时买到的开明版初版书。而张闻天翻译的柏格森的《笑》这样的美学著作，他也在谈笑中说：“你喜欢读美学书，只有这一本，我就让给你了！”是的，那时几乎是随买到家就要急匆匆地翻一遍，因为许师有一个习惯，他总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要问问，你看了哪本书、有什么发现之类的问题。至于自1954年开始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陆续整理出版的《醉翁谈录》、《绿窗新话》、《东京梦华录（外四种）》，他都及时督促我买下。这些笔记文，对我后来治学用处极大；而当我能带研究生时，也总要向他们介绍这些书，因为要想研究中国古典小说与戏曲，是不能须臾离开这些笔记的。

在中国学术史上，考据和理论研究往往相互隔阂，甚至相互排斥，结果二者均得不到很好的发展，许师却把二者纳入历史和方法的体系之中加以审视，从而体现了考据和理论的互补相生、互渗相成的学术个性。像《话本征时》这样专门考证一篇篇小说产生时代的论文，也显得血肉丰满、有理有据，无枯燥乏味之弊，而是灵气十足，真正达到了学识与才情的结合，广博与精深、新颖与通达等的平衡与调适。如果让我斗胆地概括一下许师研究古典文学的方法的话，那么我认为许师最大的研究特点在于：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的朴学，集其大成而创立了文学研究的历史主义方法，即以真实为基础，以考证为先行，联系和扣紧文本的外在因素（时代、环境、影响、作家生平等），同时保留对鲜活的作品本身的审美意趣和艺术的敏感与直觉。这无疑是一种灵性和智性高度结合的新实证主义的批评方法。这一切，我认为有中华

书局 1984 年 11 月版的《许政扬文存》在，就无需我多说了。

从以上我对许师学术成果和我的从师问学过程的粗线条勾勒，细心的读者稍加注意，就会发现，这不过是短暂的五年时间，却给我的学术生涯带来两点有决定性的影响：一、凭借研究对象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秘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人格构成；二、把握中国小说、戏曲这同一叙事文类在我国民族文化发展史上相互参定、相互作用、同步发展的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建构属于自己的古典小说、戏曲艺术的研究整体世界。

而要回到我这篇自叙性文章的主题时，我的第二点体会又是和政扬师几十年前的一句重要的话分不开的：凡是想要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和古典戏曲，《金瓶梅》这部书是绕不开的！

以上这些粗略叙述，意在说明，我在后来之所以能够研究《金瓶梅》这部难读的大书，是和许师在几年中给予我的文化学术储备、研究方法分不开的。

二

虽然有政扬先生的叮嘱在前，但严格地说，我从事研究《金瓶梅》起步很晚，其时，“金学”已经开始热闹起来，老树新花，各逞风采，我厕身其间，难免战战兢兢，跌跌撞撞走了几步，有欢乐和兴奋，也有困惑、烦恼，有时还有一种难言的寂寞和孤独。

解放前不去说它了，即使在解放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无论是在知识界内还是在知识界外，总有一些人把《金瓶梅》看成坏书、淫书，理应禁之。1958 年在“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运动中，我仅仅因为在给历史系同学讲文学史时，赞美了一句《金瓶梅》的“前无古人”的价值，就被贴了一张大字报，说我“把毒草当香花”，“企图用《金瓶梅》这样的淫秽的坏小说毒害青年学生”！而在 60 年代，我因手头有一部施蛰存先生整理删节的《金瓶梅词话》，并曾在部分教师和研

究生中传阅过，结果在所谓“312室裴多菲俱乐部”的“不正常”活动的诸多罪状中，传看和散布《金瓶梅》，也算是我的一条罪状。其实当时针已拨到了80年代时，还有人在窃窃私议，似乎谁要研究《金瓶梅》，谁就不像研究《水浒传》、《红楼梦》那样光彩；而谁要对《金瓶梅》的价值作充分肯定，谁就似乎也是不道德的了。所以我承认，恐惧思维一直积淀在我的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中，以至于一个很长时期里我几乎讳谈《金瓶梅》。我怕自己谈多了，会让人感到我和《金瓶梅》一样“不洁”。然而事实却证明，《金瓶梅》就像幽灵一样缠绕着我，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它就给我招灾惹祸。

倘若有人问我正式从事《金瓶梅》研究的动因和最初的始因时，我只能回答这是一个偶然的机。1983年，春风文艺出版社的林辰先生在大连组织了一次明清小说研讨会。为了参加这次会，我还是相当认真地思考了一些问题，最后以《〈金瓶梅〉萌发的小说新观念及其以后之衍化》为题，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表述了我对《金瓶梅》的基本评估。说实话，在论述《金瓶梅》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及其对小说美学的贡献时我充满了学术激情，我深感《金瓶梅》沉冤数百载，而我的教书生涯又时不时地和它结下了不解之缘。所以文章写开去，在理论思辨中更多融进了自己的感情因素。我意识到了，我写这篇文章时的内驱力实际上是二十多年前那张令我心慌和腿发软的大字报，以及那以后围绕着《金瓶梅》的风风雨雨的日子，所以我是在为《金瓶梅》进行辩护，也是在为自己辩护。

像人的成长一样，学术研究水平的提高也需要来自两方面的动力：批评与鼓励。在大连的会上，我对《金瓶梅》及其他问题的观点，引来了截然不同的评价。当时给我最大鼓舞的是章培恒先生。在我发言后，他即悄声对我说：“复旦出版社准备出一本辑录1983年以前各大学学报上发表的研究《金瓶梅》文章的集子，你回去争取时间，把文章先发表在你校学报上，以便我们转载。”我听后当然很兴奋，所以回校后即着手修改。当时学报编辑罗宗强先生也认为可用，并很快打出